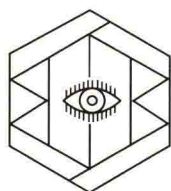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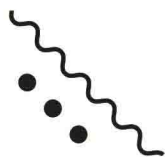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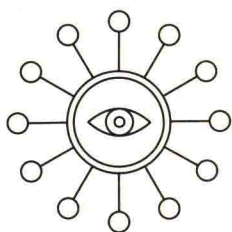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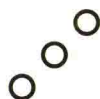
哲

学



—— 西方篇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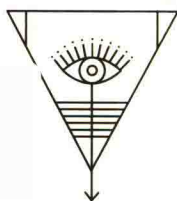
贾未舟 王明华 等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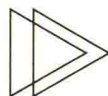
公

×

开



课



PHILOSOPHY

哲 学

公 开 课

—— 西方篇 ——

贾未舟 王明华 等著

PHILOSOPHY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哲学公开课·西方篇 / 贾未舟等著. — 北京: 新世界出版社, 2018.6

ISBN 978-7-5104-6529-1

I. ①哲… II. ①贾… III. ①西方哲学 IV. ①B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099437 号

哲学公开课 (西方篇)

作 者: 贾未舟 王明华 等著

责任编辑: 余守斌

责任校对: 宣 慧

责任印制: 王宝根

出版发行: 新世界出版社

社 址: 北京西城区百万庄大街 24 号(100037)

发 行 部: (010) 6899 5968 (010) 6899 8705 (传真)

总 编 室: (010) 6899 5424 (010) 6832 6679 (传真)

<http://www.nwp.cn>

<http://www.nwp.com.cn>

版 权 部: +8610 6899 6306

版权部电子信箱: nwpcd@sina.com

印 刷: 三河市骏杰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710mm × 1000mm 1/16

字 数: 238 千字 印张: 16.75

版 次: 2018 年 6 月第 1 版 2018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04-6529-1

定 价: 46.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印装错误, 可随时退换。

客服电话: (010) 6899 8638



前 言	西方与西方哲学	/ 001
第一章	存在主义	/ 035
第二章	实用主义	/ 070
第三章	法兰克福学派	/ 109
第四章	科学哲学	/ 138
第五章	弗洛伊德主义	/ 189
第六章	分析哲学与哲学分析	/ 209
第七章	后现代主义	/ 237
后 记		/ 261

前言

西方与西方哲学

什么是西方

一种政治意义上的西方是可以理解的，比如说西方七国的概念，但是这种政治意义上的西方的概念的基础是文化意义上的西方概念，正是文化意义上的西方概念使得地理意义上的西方概念能够被超越。

西方，文化意义上的西方究竟是什么？

当然，西方首先是一个地理意义上的概念，没有地理大发现所导致的东西方的相遇，就不会有诸如“东方、西方”的自我坐标，比如说，在这之前的古罗马人、古希腊人，甚至古日耳曼人，都不会有西方的观念。但是我们如果要对“西方”的概念正本清源，就必须回到古希腊，正如黑格尔所言：每个有教养的欧洲人每当想起古希腊，就会有家园的感觉。一个18世纪的日耳曼德国人，却把古希腊人当作文化祖先，这本身就是令人惊异的，要知道，作为一个民族国家的现代希腊，却并不属于典型意义上的西方国家。从黑格尔这句名言就可以知道，西方并不像诸如“中国”概念一样有一种种族与文

化模式的相关性，睽诸“中国”概念的形成与演化，会发现一个同质同构的同心圆的排列体系，这种情形却完全不适合于“西方”，“西方”倒好像是田径场上的接力赛，不同种族、不同地域、不同文化模式棒棒接力，最终融洽于一炉。这是对于“西方”概念的直观分析，下面就从历史进化与文化模式的角度详解“西方”。

西方文化的历史形成如果从古典时代的希腊雅典算起一直到12世纪大多数民族国家形成，历经两千余年。古希腊大约可以被认为是西方文化最早的组成部分，按照雅斯贝尔斯轴心时代理论，从所谓的“哲学的突破”开始，古希腊人为西方文化贡献了理性主义文化，古希腊人静观与思辨的存在方式，使得古希腊人可以达到亚里士多德所谓的“人在本性上的求知”，对世界充满惊异感，为知识而知识，为智慧而智慧，这是古希腊人的独特之所在，所以尽管古埃及人、古巴比伦人甚至古中国人在技术上一点儿也不比古希腊人差，但只有古希腊人有创建理论的传统，无论是科学理论还是哲学理论，这使得古希腊的哲学和科学的发展建立在扎实的系统的逻辑化的理论之上，因而绵绵不绝。由于古希腊人的“哲学的突破”要比其他文明古国对原始宗教的决绝要彻底得多，静观与思辨使得古希腊人有一种纯粹的形而上学的兴趣，所以说古希腊人对西方文化的独特贡献正在于一种形而上学的体系，理性主义的客观态度，形而上学的超验追问，即使在五大文明古国中也是独一无二的。

古希腊人从城邦制后来走向亚历山大的希腊化帝国，尽管昙花一现，但是却使希腊文化得以流播，公元前1世纪，上演了一出野蛮征服文明的喜剧，古希腊被罗马所征服，但是开明的罗马人没有毁灭希腊文化，而是接受了更为先进的希腊文化，并且和罗马的政治、军事、工程文明有效地结合在一起，通过罗马帝国的政治统治，广为传布。按照亚里士多德的说法，古希腊人长于理论智慧，但是罗马人天然长于实践智慧，这种征服与反向的征服也在中国历史上一再上演，从历史的角度看，这是有利于文化的传播、融合与再生的。

西方文化的另一个源泉是古希伯来人贡献的，古希伯来人同古希腊人、

古罗马人的生命旨趣正好互补，古希伯来人更关心来世，因而更具有信仰主义的特色。公元1世纪，耶稣诞生，并且宣称自己就是希伯来人所渴望的“弥赛亚”，这引起了犹太教的分裂，基督教由此产生。有趣的是最早的基督教新约圣经在公元二三世纪形成时，却是用希腊文写成的，如果我们考察新约圣经，会发现基督教其实就是两希文化融合的结果，基督教传播过程中最重要的使徒保罗就宣称希腊人所谓的哲学上的真理观念就是“我们的神”。基督教诞生时，罗马帝国已经征服巴勒斯坦地区，最开始，罗马统治者也迫害基督徒，耶稣就是犹太人勾结罗马人给钉死的。但是这个以“爱”为武器的宗教在二三百年的时间里呈现出巨大的生命力，最终313年的米兰敕令导致基督教成为罗马帝国的国教。这样，西方文化的三种来源就在罗马帝国的母体里相遇并融合了。罗马帝国似乎是古代欧洲与现代西方的驿站，如果没有罗马帝国的征服，或许不会有作为文化融合体的西方的产生。

但是这个时候仍然没有“西方”的观念，“西方”还有待于罗马帝国以及西罗马帝国的崩溃。公元4世纪的100年间，罗马帝国由于君士坦丁大帝力主的靠向东方的新的都城的建起，分裂为东西两个帝国，即东罗马帝国和西罗马帝国。基督教也随之分裂为天主教和东正教，他们都竭力宣称自身的“公”“正”性。476年，来自北方的日耳曼蛮族第三次洗劫了罗马城以后，西罗马帝国崩溃，历史再次上演野蛮与文明征服与反向征服的好戏，在罗马帝国的废墟上所建立的一些游牧与海盗民族国家和部落最终都接受了基督教的洗礼。800年，查理曼帝国分解，按照日耳曼人的风俗，查理曼的三个孙子分封了帝国，这就是现在欧洲大陆三个主要国家德国、法国、意大利北部的雏形，大约在12世纪，欧洲产生了诸多的民族国家，这些民族国家也经历了从封建到君主专制的转变。有意思的是，这些民族国家存在着教权与王权的二元张力（有意思的是，17世纪的英国宗教改革的直接动因是风流皇帝亨利八世同罗马教宗的离婚争执），这是因为西罗马帝国崩溃后，基督教宣称自己是精神罗马帝国的天然继承者（后来德国人就顶起了神圣罗马帝国的大帽子，严重影响了德国民族国家的建立），在社会生活中形成一

种制衡，就像封建社会国王与封建主与贵族议会之间的制衡一样，这使得尽管真的有所谓“黑暗时代”（实际上，恩格斯的这个提法粗鄙，并不是从476—1453年，欧洲神学统治大约也只是宗教裁判所存在的13、14世纪的二三百年），民族国家时代的欧洲尚保有古希腊罗马民主制的遗风，这一传承在18世纪成为所谓西方文化的核心机制，就像罗马法、日耳曼人的秩序意识成为西方文化的法律至上的精神一样。

西方在这个阶段完成一种分—合一分的三段论，从不相干的三种文化源头到九九归一，再到这种“一统”同具体民族特性相结合，比如说同日耳曼的进取、秩序、严谨意识相结合，产生作为西方典型国家的德意志，这样，理一分殊，月映万川，在每一个民族国家的文化中都包含了上述文化因子。但是，伴随着罗马帝国的分裂，东罗马以及东正教传统被排除在西方之外，包括西方文化最古老的源头希腊，西罗马帝国的废墟上所建立的信奉天主教的民族国家成为西方最早的组成部分。或者我们可以说，这个时候，作为一种地理意义上的西方大致成形，这是以排除掉东罗马疆域内东正教传统的国家和民族为代价的。这是因为罗马帝国的政治分裂与基督教的宗教分裂所产生的东罗马帝国，以及更加晚些的东罗马帝国疆域内的民族国家，在东正教神秘主义和禁欲主义的笼罩下，并且深受政治权力的束缚，不能透露出一丝现代精神的曙光。不过这时候西方文化尚未经过时代精神的淬砺，还显得粗糙与晦暗，西方精神的真正形成尚需要两个重大事件的洗礼，以及由这两个事件所激发的一种新的社会形态的出现，伴随着地理大发现，西方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化模式加强并达到了自身的文化认同。这就是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以及理性启蒙下的资本主义的兴起。

从14世纪开始的文艺复兴可以看作一种“文化重演律”的经典案例，也是西方自身一种文化寻根与文化再生的努力。回到“轴心”时代的经典并且通过重新的解释和理解以获得时代的思想动力，是西方文艺复兴的文化自觉。但其实文艺复兴却是发生于一个很偶然的事件：到了14、15世纪的西欧，真正是“黑暗的时代”，教士垄断了知识和教育，人们无法读书，无书

可读。也就在这个时候，始终在欧亚地带不断进攻东罗马帝国的阿拉伯人终于攻克拜占庭，并顺着地中海一路凯歌进入伊比利亚半岛，由于阿拉伯人距离东罗马帝国近，他们可以非常容易地接触到希腊古典时代的著作。伊比利亚半岛的欧洲人猛然读到亚里士多德，几乎大吃一惊：原来他们的文化之根在这里，还有如此灿烂的古代文明。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与希腊古典主义的穿越时空的照面，掀起了近代文明的序幕，也开始了西方文化自我淬砺和自我更新的第一步。无独有偶，1517年路德在维滕堡开始的宗教改革，也不仅仅是当下的净化信仰的需要，从历史的眼光看，也是西方文化通过回归到另一个源头来重造自身文化性格和文化动力的努力。我们发现，宗教改革，而不是文艺复兴，才是西方现代文明的秘密。

这样，在14世纪已经初具外形的西方文化，经过近三个世纪的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的文化回归式的自我淬砺，重新确认了自身的文化灵魂与文化本性。16世纪，西方人已经从13世纪开始的伟大的航海大发现，理解到了自身同东方或者其他文化模式的巨大差异。这种差异无异加强了自身的文化认同，并且在不断同外部世界的交往中加强了自身的文化自信，西方中心主义逐渐成为一种文化习惯，西方在形成，在确认。

西方在形成和确认过程中需要一场社会革命来推动完成，这就是从17世纪开始的资本主义的兴起，这种社会革新运动的哲学基础是宗教改革过后席卷欧洲的理性启蒙运动。理性启蒙与资本主义内外兼施、齐头并进，终于完成了从14世纪开始的现代转折。西方资本主义的民主、自由、平等、法制的理念，得以从哲学层面落实到现实层面，从而从诸多已经显露衰态的各种古代文明中脱胎而出，以西方文化中心主义的姿态君临这个星球。西方文化得以形成，现代资本主义的社会理念与古老基督教信仰构成西方文化的两大表征。它甚至走出地域限制，在北美、大洋洲的英属殖民地再次完成了西方文化的又一次移植，这种移植已经走出种族限制，就像在两千多年前它走出地域与种族限制一样。

我还想说的是，西方文化真正的精神特质其实包含在基督教里，基督

教而不是东正教才是西方式的，改革过后的基督教是复活的希腊理性精神和希伯来古老信仰的结合体，因而在理性和信仰——人类精神发展的两大动力源——这两个方面为西方得以君临天下提供了主要力量。可以说，基督教才是西方文化的基础，基督教本身就是两希文化融合的产物，基督教中包含了西方现代文化的所有因子，无论是西方文化中显性的科学文化，还是隐性的精神文化，无论历史上基督教处于怎样的政治、文化境遇中。

希腊、罗马、西罗马、民族国家，基督教传统、理性主义、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的法治等，这些历史和思想的因素的因缘际会，促使以欧洲为基础的西方这个概念，从地理、政治概念走向具有深厚的社会、历史、心理基础的文化概念，并逐步建立了文化认同。

哲学是什么

哲学是什么？这个问题已经问了两千年，关于哲学的答案仍然莫衷一是。这种情况预示着哲学这种现象或者这种学科的独特性。比如说，常和哲学放在一起的科学、艺术和神学等学科的定义就没有这么麻烦，尽管它们在不同的时代也有非常不同的特征。哲学给人的感觉似乎是没有学科底线的，哲学的不可定义性的一个很明显的例子就是：两种相互攻讦、完全南辕北辙的思想可能都会宣称自己是真正的哲学，从科学这种学科的眼光看来，这是非常令人惊奇的。也就是说，当你严格断定哲学是什么的时候，是非常危险的。不过，和“哲学是什么”这样的提问句式不同的是，“什么是哲学”这样的提问方式似乎就温和得多，至少不会因为严格的定义而以偏概全。进一步，我们在说明“什么是哲学”之前，先梳理一下什么不是哲学，用排除法把哲学的外围清理干净了，哲学的真容或许就比较容易凸显出来。

罗素在《西方哲学史》中说，在完全确证的科学和完全不确证的神学之间，还有一片更广阔的领域，这是哲学的世界。当然，这里所谓的哲学，是广义的，有点儿等同于人类生活的全部。人们习惯以科学、神学和哲学来概括人类的学科和知识的范围，并不完全准确，我们要说明的“哲学”，也只是科学和神学之间的广阔领域的一小部分，在古希腊以及更早期的时候，哲学是连科学都包括在里面的。如果以人类今天的学科或者知识体系来看，哲学也只是人文科学的一部分，这样的学科或者知识体系还包括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思维科学。哲学当然不是自然科学，因为自然科学所研究的自然现象是哲学无能为力的，自然科学通过观察、实验分析、理论严格推论所获得的知识，是一种可以证实的知识。社会科学研究的是社会现象，它的结果是弱化的知识，自然科学知识和社会科学知识都是经验知识，这样，我们可以说，思维科学是先验知识。而神学，则可以称之为超验的知识，如果它还能够被称作知识的话。

学科意义上的广义科学，只是一种知识产生和存在的方法和形式，特征是理论性和系统性。在这个意义上讲，神学也是一种科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的宗教学当然也是。从学科意义上讲，哲学也是一套极度弱化的知识体系，当然也可以被称为“科学”。所以，不能说哲学“不”科学，但是哲学是“非”自然意义上的科学。只有迷信、个人经验、巫术等不具有知识形式的存在体系才是“不”科学的，或者说“反”科学的。从学科意义上的广义科学，就是要撇清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和思维科学之间的区隔，承认这种区隔的存在，同时也是承认“唯科学主义”的不当，每一种科学体系都有自身不可僭越的“意义世界”，在更高的层次上可以通约，但是必须以承认它们之间的不同并且平等为前提。

从理性 / 非理性 / 不理性的角度也可以用来表明哲学作为一门学科的知

识体系的独特性。“理性”一词，歧义颇多，英文对应“reason”，有“按事物的本来面目而对待之”之意，由“reason”（事物或行为的“原因”和“根据”）引申而来。在英国哲学家罗素看来，理性就是“为了达到某种信念而思考一切证据的思维习惯”。对一个理性者而言，不能把握确定性时，或然性最大的意见将受到重视，而那些或然性较小的意见则留作需要进一步说明的假设，等到新的证据来帮助它，也就是说，“理性”最一般的表现是：我们在大多数场合能靠“客观的方法”来确定事实与可能性。这里所说的“客观的方法”是说，我们将要从事的研究或行为在开始前就承认我们所要做的事情本身包含了一定的内在的、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规律，并且这种规律也要求人以自身所固有的“客观”态度面对它。说当代社会是理性的时代，人们都遵循理性而行动，大概没人反对；学科的知识论基础是“理性”建构，是“理性”的方法论的结果，这也是常识。

没有一个现代学科不是建立在“理性法庭”的基础上，尽管只有科学理性才是真正的纯粹的严格的理性。在理性高扬的18世纪，理性简直是判断一切合法性的准绳，所以才有德国浪漫主义的反动，以至于出现声势浩大的19世纪非理性主义哲学思潮。但是非理性是“反”理性的吗？实际上从叔本华到福柯，所有标榜非理性的思想家都不是“反”理性，理性是人之为人的基本禀赋，意志和情感再重要，也不至于要去掉理性主义，所以说20世纪是“非”理性主义勃兴而不是“反”理性。这里理性与非理性并不构成存在的两极，理性与反理性才是两极，用英语来表达就是non-与a-的差异。在理性与反理性之间还有一片广阔的领域，那是非理性的世界，理性与非理性都构成人类把握自身、把握世界的方式。所以我们可以讲艺术是非理性的，但并不反理性，哲学中有些是理性主义哲学，有些是非理性主义哲学，是可以并立不悖的。真正构成反理性的只有一种存在，那就是迷信，迷信才是理性的对立面，迷信才是反理性。从这个意义上讲，人类的所有的学科在广泛的意义上讲和迷信构成两极，进一步讲，科学和宗教并不是对立的，它们只是理性内部程度不同的差异，科学和哲学也是这样。所以说科学中心主

义就像宗教中心主义一样荒谬，人性的需要就像一个圆圈，每一个学科都占据着一个扇面，它们之间的重要性的程度只是对个体选择时才有意义，在人性的层面上，任何一个学科都是并列的。而且它们都具有自身特定的研究对象、研究方式、研究结果以及思维方式，严格的意义上讲，他们之间是不能比较的，一种科学理论只能和另一种科学理论相争论，相比较。科学和宗教不能比较，就像面包和矿泉水不能比较，科学和宗教不会冲突，就像关公和秦琼不会打架。历史上所谓的“科学的每一次进步都意味着宗教的每一次进步”的说法只是表明，科学在和一种貌似或者假装是科学的宗教理论在冲突。科学、宗教、哲学和艺术等人类的文化模式就像柴米油盐酱醋茶，不能乱用，但是谁也离不开谁。

凡是人类的学科，都必然是理性的，但是理性的程度有所不同，自然科学和思维科学当然是纯粹理性，而社会科学是社会理性，人文科学是价值理性。可以通过谈西医和中医的差异来进一步表明非理性与反理性的不同。我们说西医是科学，当然是理性的，当然可以治病。中医几千年里也可以治病，但是中医并不是科学，并不是理性的产物。所以，并不是只有科学理性才可以治病，中医并不是反理性，而是一种非理性，非理性的存在和理性的存在都是人类的存在方式。

二

以学科角度说哲学，是一种现代叙述，因为哲学成为一个学科，是18世纪康德以来的事情。以学科的角度谈哲学，也只是说明了哲学的独特性，也就是回答了“哲学不是什么”的问题，但是哲学是什么依然是个谜。即便我们已经很明确了“什么是哲学”的问题，也不能说清楚哲学是什么。比如说本体论、知识论、认识论、美学等都是哲学，但是不能反过来说，哲学就是本体论、知识论、认识论、美学等部分之和。从逻辑学的角度讲，“哲学是什么”的问题，关乎的是哲学的同一性问题的本质规定，而不是其关系属性的规定。

但是正如本文第一段所言，定义性地回答“哲学是什么”，不但是困难的，而且是危险的。每个历史时期哲学的含义分歧之大，以至于要把那些号称是哲学的思想都笼络在一起并且以一种一致的角度来叙述，是极端困难的。当然有种方法，那就是不断放宽哲学的边界，以至于两种相反的哲学观点都能奇特地存在于哲学的名号下，但是这样关于哲学是什么的问题可能仍然无法澄清。哲学史上，很少有哲学家去做这件事情，大概他们都感觉到这个问题的麻烦，所以如果我们一定要谈哲学是什么的问题，就不应该追求哲学的严格的实体质性定义，而是应该对哲学做一下功能性的描绘。即便是这样，关于“哲学是什么”的问题，也只是具有相对的意义，就像任何哲学家的哲学思想无论其宣称如何是真理的体现，历史地看都只不过是人类思维靠近真理的一小步。所以，在这里，我尝试给哲学下一个定义，实际上是对哲学做一个比较宽泛的功能性描绘，我觉得哲学就是哲学史，哲学史上的哲学都是在讲道理，哲学就是一门讲道理的科学。

受以前那种把哲学当作一切学科的基础的学科帝国主义思想的影响，哲学总是被赋予一种“基础、本质、终极”的影响，实际上，在哲学史上，哲学也确实不恰当地曾经多多少少被承担过这种工作。休谟以来，这种帝国主义大厦如果不是彻底倒塌了，也是受到普遍的质疑。哲学的这种现代命运有点儿像宗教。在古代社会，宗教曾经被赋予一个绝对中心的地位，而近代以来，康德思想的影响下，宗教越来越回归自己独特的价值，也越来越远离自己本不该觊觎和插足的领域。人类的不同性质的追求所整合成的一个各司其职的社会，给人们带来的不仅仅是效率的提高，更重要的是各安生理、各司其职、各尽所能的和谐。宗教的战略退却和回归本色不会减轻信仰的力量，反而是带给人更真实的震撼性影响。相对于曾经的哲学帝国主义和宗教帝国主义，如今的科学帝国主义带给人们的负面感受或许还不那么强烈，但是只要任何一个学科仍然以一种帝国主义的眼光，也就是那种基础主义、本质主义、终极主义的傲慢与偏见，来看待学科之间关系，就不能洞察自身和他者独特的价值和贡献。从这个意义上讲，把哲学说成是一种讲道理的科学，貌

似咖啡馆里的轻慢和闲适，并无损哲学的崇高和伟大。

哲学所研究的对象，既不是自然现象也不是社会现象，凡是对于现象的研究的学问，一定是科学，不管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也一定是具体的研究，其目的是为了获得知识。人类不以现象为研究对象的学科只有三种，一是数学，一是逻辑学，再者就是哲学。这三个学科也都是科学，都和思维相关，前两者研究思维的规律，而哲学研究思维方式，对于人类思维的研究没有尽头，但是哲学的野心似乎更大一些，因为哲学想通过思维方式穷尽宇宙、人类的所有问题，尽管这一点事实上从来没能做到。但是没能做到不应当是对哲学的谴责或者揶揄，而恰恰是哲学本性的体现，如果哲学也能意识到自己对于那些永恒的问题的答案不应该太有独断论的色彩的话。

不以现象为研究对象的学问都是最基础性的，而哲学研究的问题，都是一些宏观的抽象的大问题，比如说世界、人性、人生等，这些问题之大，以至于衬托出人类思维的局限：我们永远无法获得这些问题的确切答案。不研究现象，不以知识追求为鹄的，冠以爱智慧的美名，但是一个学科却不能提供知识性答案，即便是知识性的预期。所以我们对于哲学的定义，最好是描述性的，最好足够宽泛，我试着给哲学下个不是定义的定义：哲学是一门讲道理的学问。

三

有两种“理”，一是物之“理”，也就是物理，大凡以自然为研究对象的学科都是表现为对物理的探究，其结果的形式是知识。还有一种理是“人”之理，既可能是直接谈“人”之理，也可能是综合谈“物”之理和“人”之理，因为物理和“人”之理可能相关，其结果的形式要么是关乎“人”的弱化的知识，要么是关乎人的“生命”智慧。我们说哲学是一门讲道理的学问，这个“道理”就是人的“生命”智慧，大概这是东西方哲学共同的本初的追求，哲学史上任何对于这一本初追求的根本背离都可能是迷途，最终是失败的（关于这一论断，可能是很危险的，并且有独断论的嫌疑，不过，熟

悉哲学史的人都知道，哲学曾经奋不顾身承担的使命，比如说近代知识的探究，很显然是对古希腊哲学本性的偏离，这种努力也最终被证明是不恰当的。当科学最终成长起来时，哲学只能也必须退出这一领域，哲学在哲学史上的战略性的撤退和宗教在近代以来的明心见性的收缩是一样的，都通过否定自己而获得了本质的自我）。

关乎人的生命智慧的学问，可以称作道理。哲学可以称作一门学问，而不大适合是一门学术（哲学史称为一门学术倒是没问题，前面说到作为一种学科、一种科学，也主要是侧重于哲学史而言，从当代的视野看，哲学史已经是哲学活动的主要领域，这是人类创造性弱化的一个标志）。学问和学术不同，前者是开放性的探究，正所谓的“追问”，后者则侧重于规范性的追求的味道。古希腊人把哲学称作“爱智慧”倒是很贴切的，也就是说，哲学不是智慧的学术，倒是智慧的学问，其中的玄机就是这个“爱”字，这个“爱”和“追问”的意蕴是一致的。

“道”理是中国哲学的说法，“道”的存在应该从天道和人道内在一致性的角度来理解，“道不远人”就是这个意思。但是“道”理无论是天道还是人道，都必然具有形而上的味道，在这个意义上，哲学是一种形而上学。

说哲学是形而上学，必定会联想到哲学史上对于形而上学的猛烈的批判，但是我觉得，这种批判有一个科学崛起的背景，这种批判只不过帮助形而上学厘清了自己的来龙去脉和真核而已。休谟要把形而上学扔到火里去，是英国经验论的极端想法，他看到的形而上学的局限，只不过是形而上学不该踏足的领域。人类是需要形而上学的思辨的，是因为人类的存在不能只是局限在现象的世界，在某种意义上讲，形而上学与其说是一种生命智慧的探寻，毋宁说是一种生命的超越性追求。这一点在萨特的《存在与虚无》里表达得最为明显：人的存在是从自在的现象界无限地向自为的未知世界的超越立场。当我们经历了近代以来的科学的喧嚣、偏见和戕害后，人类开始完整理解人性的多方面需求，尤其是形而上学这种“无用之大用”的学问。正如《人论》中所表达的，在这里，科学、宗教和形而上学应该是一种温情

的、彼此尊重的结盟关系，而不应该是非此即彼你死我活的冲突性关系，应该共同服务于人类的幸福和人性的完善。形而上学所讨论的一些问题，并不在于立刻获得答案，事实上，这些问题不可能获得终极性答案，或许休谟是对的，形而上学的命题不是分析问题，也不是综合问题，但是这些问题诸如人性、人生、永恒、存在等，对于人类的超越意识的保持以及生命价值的关切，确实是不可或缺的，人类的存在，怎么可能简单为当下化、数字化、程序化、技术化呢？

哲学应该承认自己的形而上学的本质，这种诚实不会减弱哲学的价值，却能增强自己的信心：我们都承认，只有你的价值是独特的，你才是有价值的。另外一个方面是，如果不承认哲学的形而上学的本质，哪个领域才可能是哲学的世界呢？除了形而上学，其他领域已经不再是哲学的殄域。哲学并不像曾经宣称得那么重要，但是也绝不是像技术思维所攻击的那么一无是处。

形而上学这个词最早指的是亚里士多德所谓的“metaphysics”，这个词的指谓本来是“物理学之后”的意思，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对“存在者之为存在者”的探究具有后世所谓的抽象义的“形而上学”意味。把“metaphysics”翻译为形而上学是受《易传》中“形而上谓之道、形而下谓之器”的启发，这个翻译或许是东西方文化交流史上最为经典的实践之一。汉语世界的“形而上学”就是“道”，哲学就是讲道理的学问而不是认识物理的活动。

“讲道理”，即使只是在日常生活界，也是一种理性意识，也就是说，我们“讲道理”而不能不讲道理，因为不讲道理可能解决不了任何问题。所以说哲学是一种理性的活动，是没有问题的。“讲”字具有发而皆中节之味道，也就是说，我们要“讲”，不能不讲，是那种温和的商谈意义上的“讲”，不是那种盛气凌人的宣讲，哲学根本就是发现问题、探讨问题的一个过程。讲“道理”，“道理”能讲清楚吗？“道可道，非常道”，人去讲“道理”，可以，但是要终结之，一劳永逸解决之，是不可能的，因为，这是人的有限性所决定的。但是，是否因为人的有限性所决定的对于“道理”的不可穷尽，就不